

# 阮籍評傳

韓传达 著

鳴鶴嬉庭樹，  
焦明游浮雲。  
鳥見孤翔鳥，  
翩翩無匹群。  
死生自然理，  
消散何續紛。



北京大學出版社



# 阮籍评传

韩传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籍评传/韩传达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ISBN 7-301-03341-9

I. 阮… II. 韩… III. 阮籍(210~263)-评传 IV. K825.6

**书 名:**阮籍评传

**著作责任者:**韩传达 著

**责任编辑:**王春茂

**标准书号:**ISBN 7-301-03341-9/1.419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55千字

1997年6月第一版 199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1.00元

# 序

褚斌杰

阮籍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和诗人。他的历史地位与屈、陶、李、杜等伟大作家相比，或尚难并肩，但他在思想和诗艺上的独特贡献，却又是其他诗人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于魏、晋之际，他属于最有成就的作家，所谓“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柳亭诗话》卷三十）。如果再从他对后世左（思）、陶（渊明）、陈（子昂）、李（白）的深远影响看，从他对五言诗体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看，其贡献和成就则更不能低估，足以使其声名千古不泯。

说起阮籍，我对他的兴趣和了解最先不是起于读他的诗文，而是关于他的生平轶事。年轻时我喜读《世说新语》，他的纵酒佯狂，放荡不羁，富于传奇色彩的行止和性格，使我感到惊异，在我印象里他是个地道的奇人狂士。因人及文，我也拿他的诗文来读，但却颇觉难懂，这难，主要不是词句上的，而是“归趣难求”。他的《咏怀》八十二首，既名“咏怀”，当然是有感而发，但只觉篇篇诗中有股孤凄悲凉和无可告诉的忧思，而具体所向却又难以指实。但对阮籍的诗我仍喜爱读，只觉得他人奇而性真，其诗风格清丽，蕴深而调远，读之另有风神。我也自知，这对于理解阮诗来说，不过是浅求之，远未能深入诗人的无尽藏之怀。因此，作为阮诗的一个爱好者，我一直希望有那么一本专著，使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对阮籍其人其文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这一愿望也就真的实现了，这就是韩君传达送来的这本十多万言的《阮籍评传》。

韩君的这本大作，依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极可称道的。

其一，是史料齐全，考辨精细。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确是下了工夫的。作者钩沉古史，爬罗剔抉，不仅对诗人阮籍生平行止做了详述，还对其先世、家庭、师友等各个方面，做了考求；遇有阙疑，并详加考辨（如仕历、交游、作品系年等）。这样就使读者于千载之下，还能对诗人有较为翔实的了解，也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其二，阮籍是一个思想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其行止更是怪怪奇奇。怎样来认识和评价这样一个人物呢，这就需要结合他的时代环境、生平遭际予以透里的分析。作者主张“在研究阮籍思想时，要注意区别他的心与迹”，即要透过诗人自己织成的层层面纱，了解他的“初心和真面目”。书中花了很大篇幅，对阮籍的嗜酒、痴狂、企仙、慕道、求隐一一做了分析，说明阮籍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祸、发泄、自怜和解脱，同时也是一种反抗。“在放荡中寓庄严，酣饮中有血泪。”正是通过作者这样深入底里的分析，从而使我们了解到诗人的一颗苦闷的灵魏，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上少有的严酷的时代。

其三，诗出于人，一般说来，对诗人的行止、思想有所了解，对其创作也就会较为容易的理解了。但对于阮籍来说，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如前面我们所说，他的诗文，特别是代表其主要成就的《咏怀诗》八十二首，理解起来还是颇困难的。每每令人“难以情测”（《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李注）、“归趣难求”（钟嵘《诗品》上）。这无疑是由于诗人在当时严酷政治的高压下，不得不“文多隐避”的缘故。因此，解诗就成为阮籍研究中的大难点。应该说，在这方面前人已做了一定的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浮于表象，只抓住作品中的只言片语，就加以解评，因此往往失之于浅，以至于谬。而另一些人，往往又过于深求实指，如认定某诗某句即指某人某事，表面上以史解诗，但又缺乏确凿的论据，从而总令人有种牵强附会之感。而《评传》的作者，则力图克服这两种倾向，既不“怯言其志”，又不毫无

根据地指实,而是结合诗人的思想、经历、环境细加辨析,分类论评,从而对大部分的《咏怀》之作,都能给以深入而圆通的解释。另外,作者对阮诗艺术的领会和剖析,也是十分精到的。作者一方面对阮诗做了宏观的审视,以“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为题,全面剖析了诗人的人格、性情、个性,并由此概括了阮诗的整体艺术风格;同时,更对阮诗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如比兴、对偶、用典、炼意、炼句、炼字等,做了极为深细的研究。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阮诗艺术最为全面的论析。

“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读了韩君这部著作,不由得令人想起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的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时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韩君可谓诗人千载之下的一位“知音”。

韩君早年从宿学段熙仲先生治中古文学,后任教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80年代,因与我共同合作担任电大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而有相识之雅和切磋之谊。书成,蒙韩君不弃,嘱予为序,敬佩之余,聊陈数语,权为之序云尔。

1997年元月于北京大学

畅春园寓所

## 目 录

序 .....	褚斌杰(1)
良辰在何许 凝霜沾衣襟 ——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 .....	(1)
四时更代谢 日月递差驰 ——诗人的家世与生平 .....	(14)
烈烈褒贬辞 老氏用长叹 ——诗人的思想 .....	(27)
谁言不可见 青鸟明我心 ——《咏怀诗》的思想内容 .....	(42)
云间有玄鹤 抗志扬哀声 ——《咏怀诗》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	(68)
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辉光 ——《咏怀诗》的比兴艺术 .....	(82)
凤凰鸣参差 伦伶发其音 ——《咏怀诗》艺术散论 .....	(95)
多言焉所告 繁辞将诉谁 ——阮籍的文与赋 .....	(109)
一去长离绝 千岁复相望 ——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	(128)

附录 .....	(154)
阮诗无酒说.....	(154)
《为郑冲劝晋王笺》考年.....	(165)
《大人先生传》考.....	(170)
竹林之游三考.....	(174)
主要引用和参考书目.....	(182)
后记 .....	(187)



## 良辰在何许 凝霜沾衣襟

### ——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县，今属河南省）人，生于公元210年（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五年），死于公元263年（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是建安黄初之后，正始诗坛上最主要的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镇压了黄巾起义的军阀，又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战争。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的政治条件和他本人的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统一了北部中国。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了魏。接着，西南的刘备建立了蜀汉，东南的孙权建立了东吴，开始了史称三国的时代。战乱和饥荒使整个北方中国人口损失十分惨重。蒋济上疏明帝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曹丕代汉自立以后，政治上缺少曹操的雄才大略，但却企慕汉文帝的明君风度，他写了《太宗论》（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主张像汉文帝那样对远方分裂的国家“抚以恩德”。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他率十余万大军准备渡江伐吴，兵至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见长江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录》）他缺少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

为了获得世族地主的支持，曹丕又改变了曹操压抑豪强的政策，在即位之初就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实行了向世族地主让步的“九品官

人之法”，承认世族地主对仕途的控制权。“九品官人之法”是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的用人制度，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现象。

在曹丕之子明帝曹叡死后，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司马懿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大权，司马懿和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在残酷的杀戮中终于夺取了曹魏的政权，建立了晋王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动乱时代里，掌权的统治集团，总是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杀戮反对自己的政敌。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新王朝的建立者，不惜以最毒辣凶残和阴险的手段屠杀旧王朝的维护者，为新王朝的建立奠基。

汉末，曹操杀反对他的名士孔融其手段就十分卑鄙。他杀孔融的“理由”有二：一是孔融不忠，说他“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二是不孝，说他“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甌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这两条理由，特别是第一条，在曹氏欲篡汉自立的时候，是多么可笑，多么虚伪！其实孔融之死并非是他不忠于汉，相反，倒是曹操怀疑他太忠于汉，于自己的图谋篡汉不利，所以才借不忠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除去心头之患。

到了魏末，司马氏照演曹操故伎，也大杀政敌和名士。魏明帝死时，继位的小皇帝曹芳才八岁。明帝临死之前，忍死以待，把政权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两个大臣。曹爽是固执而又肤浅的贵公子弟，司马懿却是老谋深算，干练机警的军事将领。明帝死后，两人立即开始了角逐政权的斗争，经过十年的暗中较量，公元249年（曹芳嘉平元年）春，曹爽陪侍皇帝离开洛阳去祭扫高平陵（明帝陵，在洛阳南），司马懿利用这个机会在洛阳发动政变，挟持太后，迫使他下令免除曹爽兄弟的职位，以侯就第。事变后，司马懿又以“阴谋反逆”的罪名斩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皆夷三族。从此，

政权完全落入司马氏掌握之中。

公元 251 年(嘉平三年),司马懿鸩杀太尉王凌,杀其党羽,皆夷三族,并杀楚王曹彪。

公元 254 年(嘉平六年),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皇后父光禄大夫张辑等,皆夷三族。同年废皇帝曹芳,以齐王归藩,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公元 255 年(曹髦正元二年),司马师斩镇东大将军毌丘俭,夷三族。

公元 258 年(甘露三年),司马昭诛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夷三族。

公元 260 年(甘露五年),司马昭弑皇帝曹髦,杀尚书王经,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公元 262 年(曹奂景元三年),司马昭杀名士嵇康和吕安。

这样大规模的杀戮,使得正直的知识分子处在“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三,本文所引阮诗均据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的可怖境地,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一时“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连干宝也无法掩饰(干宝是晋人,修本朝史,当有所讳),他在《晋纪·总论》中也承认:“宣、景(按,指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杰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由此可见,司马氏在夺取政权之际翦灭异己政敌是何等毒辣凶残!

## 二

这个时代是黑暗的时代,动乱的时代。但是中国古代史上这样的时代却往往是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的时代,统治集团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权的角逐上,无暇顾及对学术思想的控制,客观上给学术界、思想界较多的自由的空气和土壤。另外,知识分子在统治集团的政权角逐中,常感到有生命之忧,所以他们也常把在太平时代对爵禄的热衷转

移到比较安全的学术研究上。这样，学术思想就活跃起来了。

西汉时，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从东汉末以来，儒家思想正从“独尊”的地位跌落下来，老、庄的道家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热烈的推崇。《周易》和《老子》、《庄子》两部道家著作被哄抬到了“三玄”的崇高地位，在知识分子中有着极大的影响。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都精通老、庄哲学，其中有的人就是有名的玄学家，他们的玄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例如正始名士的何晏有《论语集解》、《道德论》、《无名论》等，王弼有《周易注》、《老子注》、《论语释疑》等；竹林名士的嵇康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阮籍有《通易论》、《达庄论》等，向秀有《庄子注》。

为什么道家思想在魏晋之际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呢？汉末之乱，天下分裂，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分崩离析，儒家思想失去了“独尊”的政治基础，它既不能为统治阶级收拾动乱的局面，又不能给知识分子士大夫以适应乱世的指导；统治集团不能以它来治世，知识分子又不能以它来应世，于是它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没落是必然的了。但老、庄思想却能应运而盛。老子主张无为，这正好给对世道失去信心的知识分子消极避世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周易》有神秘主义因素，纷乱黑暗、变幻难测的政治局面，倏忽不定、生死难卜的个人命运都可以从中找到随心所欲的唯心主义解释；《庄子》等是非、齐贵贱，蔑视礼法、崇尚自然的主张又是一些知识分子逃避现实政治斗争，追求放荡生活的最好借口。而当统治集团以“名教”为标榜，篡夺政权，强化统治的时候，正直的知识分子又可以利用老、庄思想对之进行积极的斗争和消极的抵制。所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界老、庄思想最为活跃，各种阐述老、庄哲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老、庄思想几乎垄断了思想界。

### 三

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而统治者又提倡通达（例如曹丕，傅玄就说他“慕通达”），因而清谈、饮酒、求仙，追求狂放旷达成了多数知识分子名士们的生活风气。

清谈是从汉末的清议演变而来的。汉末的清议的主要内容是品评人物，讥议时政。当时外戚和宦官轮番相次把持政权，政治动荡而黑暗，在京师太学读书的太学生们对于繁琐的章句之学已经厌恶，遂把注意力转移于现实政治，于时出现了讥议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后汉书·党锢列传》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这可称之为太学清议。太学清议注重的是对现实政治人物的议论品评；但东汉时还有一种乡间清议，东汉选拔人才的方法是征辟察举，其根据就是乡间清议。于是对于人物的批评品题在当时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刘劭《人物志·效难篇》说：“好说是非，则以为臧否；讲目（即品题），则以为贤愚。”这说明对人物的品评往往是士人贤愚臧否的标准。例如：

李元礼（膺）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世说新语·德行》）

陈仲举（蕃）尝叹曰：“若周子居（乘）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世说新语·赏誉》）

李膺、陈蕃均汉末大名士，受其口题则声价十倍，“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德行》）。

汉末清议内容主要是品评人物，其标准主要是以名教为依归。我们认为清谈之所以来自清议，正是因为早期的清谈内容正是以品评

人物为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张璠《汉纪》说：“孔公绪（佺）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根据《后汉书·郑太传》注说：“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所谓“谈论抑扬”不就是臧否人物的清议吗？所以孔佺的清谈就是清议。《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记曹丕与钟繇书曰：“至于荀公（爽）之清谈，孙权之妩媚，执书嗷嗷，不能离手。若权复黜，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曹丕把荀爽的清谈比之于许劭的汝南月旦评，所谓“汝南月旦之评”，正是许靖、许劭主持的乡间人物清议，所以荀爽之清谈仍是人物批评。又同书《蜀书·许靖传》云：“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这里把“清谈”与“爱纳人物，诱纳后进”相联系，证明这“清谈”正是许靖、许劭早年在家乡的“汝南月旦之评”的“核论乡党人物”（《后汉书·许劭传》）的乡间清议。

以上都说明清谈源于清议，其内容最初仍是人物批评。清谈之脱离清议，变成谈玄论道，其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对知识分子名士的杀戮，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士的言论凡涉及时政和执政人物的，都遭到惨重的打击，阮籍“不与世事”，但钟会却“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所以不得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这种“口不臧否人物”的“发言玄远”就说明了清谈已脱离了具体的“核论人物”的清议，而走上了抽象的探究玄远哲理的玄虚之路。

真正的玄谈始于何晏、王弼的“正始之音”。《晋书·卫玠传》说：

（王）敦谓（谢）鲲曰：“昔王辅嗣（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晏）若在，当复绝倒。”

可见所谓“金声”、“玉振”的“正始之音”就是所谓玄学“微言”的清谈，亦即是以论辩形式展开对玄学“胜理”的探究。例如《世说新语·文

学》篇曾记正始中两大谈士何晏、王弼的一场清谈论辩：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及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王都是当时最有名望的玄学家，对《老子》、《庄子》、《周易》都有极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的“胜理”当然是指玄理。从以上的引文中，还可以看出，清谈的形式是一人提出自己的玄学论点，一人加以驳难。清谈是相互驳难还有一个例证，也见于《世说新语·文学》篇：

殷中军(浩)为庾公(亮)长史，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桓公(温)、王长史(濛)、王蓝田(述)、谢镇西(尚)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这里明白地指出这是一次“清言”(即清谈)，这样的清言就是“正始之音”，他们的清言内容是“共谈析理”，形式上是“共相往反”，即相互驳难。顺便指出，王导“自起解帐带麈尾”，是当时清谈时的一种名士风度，谈士们常手持麈尾以助谈兴。《文学》篇记“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

如果双方谈士清谈时互不相让，互不认输，这时就有第三者作总结：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世说新语·文学》)

当然也有谈论双方俱能言之成理，因而不分胜负，这时双方及听众便“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了。

如果把他们互相驳难的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很精妙的驳论文章。《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中兴书》说：“殷融字洪远，陈郡人。……著《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殷融的所谓“退而著论”当就是清谈玄理后的笔录。再看嵇康有《养生论》，向秀有《难养生论》，嵇康再有《答难养生论》，张邈有《自然好学论》，嵇康有《难自然好学论》，阮侃（或云张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有《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阮侃再有《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再有《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这些互相反复驳难的文章，起初也当是清谈时的难论，后用文字记录下来，收入了文集。

清谈的形式也还有自己设问，然后自己作答的。上文引《文学》篇何晏、王弼清谈的材料后有“于是王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的话，据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192 则所谓“客主”是“问然后答，因献疑送难而决疑解难”，因而所谓“自为客主”，就是自己设问（自为客）自己作答（自为主）。其内容当然还是谈玄析理，不过其形式乃是一人“自为客主”而已，这当然也是一种形式的清谈。

魏晋文人的文集中有不少谈玄理的文章都用设问自答的形式，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设秦客与东野主人的问答，阮籍的《达庄论》，设缙绅好事之徒与先生的问答，《乐论》设刘子与阮先生的问答都是。《嵇康集》中的《明胆论》有“易了之理，不在多喻”的话，《文选》卷三九任昉《启萧太傅固辞夺理》注引此二句却作是吕安《答嵇康论》的话。这就说明《明胆论》是嵇、吕二人合作，是他们清谈的笔录。当时的一些“论”文似都应作如是观。



## 四

饮酒也是当时的一种时代风尚。

酒作为一种饮料，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商周时代，在奴隶主贵族间酒风就很盛。但是酒与文学结合起来，文人饮酒形成风气似乎始盛于汉末。《古诗十九首》中有“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之句，这时候，文人在诗中开始注意对酒的描写。

汉末的孔融是个大名士，酷爱饮酒，他曾说过：“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他为了反酒禁，与曹操争论，本传说：“时年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终于积嫌成忌，最后被曹操杀了头。

曹操因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原因进行禁酒，不无道理，但他自己也并非不饮酒。他在诗中常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同上）

曹操之子，建安文学泰斗曹植更说：“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箏；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与吴季重书》）他自己就是由于因为“饮酒不节”而失去了父亲的宠爱（见《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

当曹丕主持建安文坛时，宴饮是他团结文士的重要方法，在《与吴质书》中，他追忆与王粲等人的宴饮吟咏生活是“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所以建安七子也都是饮酒的，在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等的诗文中留下了不少宴饮的篇章。“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榭。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这是王粲等人在曹氏父子幕下的共同生活。到这时候，酒与文人，酒与诗，已经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到了阮籍生活的魏末，士大夫之间饮风更炽，包括阮籍在内的竹